

宋元传记资料中的夏竦形象塑造 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刘敏 邓洪波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湖南 长沙 410012)

[摘要] 在宋元传记资料中的夏竦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英宗忌憚仁宗旧臣,为援引亲信张本,在《夏竦神道碑》中塑造了东宫旧僚的夏竦形象,并对《仁宗实录·夏竦附传》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夏竦在对夏问题上与神宗开边之策不合,导致了神宗时期《两朝国史·夏竦正传》中夏竦形象的“奸邪化”,而此时曾巩在《隆平集·夏竦传》中塑造了别于国史的夏竦形象,却秘而不宣。王称在《东都事略·夏竦传》中将夏竦与庆历诸君子的矛盾描写得更为丰满。元朝史臣对《两朝国史·夏竦正传》作了细节修改,最终形成《宋史·夏竦传》。了解夏竦的形象塑造及其政治文化背景,既可重新认识夏竦及仁宗政局,也可观时代的变迁。

[关键词] 夏竦 庆历新政 形象塑造 政治文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23) 03-0009-13

夏竦,字子乔,为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曾任参知政事、枢密使,以“奸邪”和颇有才学的形象为世人所知。不过这一众所周知的形象,与真实存在的夏竦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而认识真实的夏竦形象,夏竦的传记资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史料。夏竦的传记资料主要集中在宋元之间,有《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仁宗实录·夏竦附传》《两朝国史·夏竦正传》《隆平集·夏竦传》《东都事略·夏竦传》《宋史·夏竦传》共6种。在编撰这些传记时,编撰者通过对于史料的剪裁和书写,来实现对于夏竦的形象塑造,以满足当下的表达。总体而言,宋元传记资料中的夏竦形象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经历了从正面到负面的转变,在这一形象转变的背后,蕴含了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从这一层面说,夏竦的传记文本承载了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在这文本的形成过程之外尚有史实的存在,客观认识史实需要剥离文本中存在的修饰、歪曲,而这一剥离工作的展开是建立在认识其形象塑造基础之上的。客观认识夏竦及其时代,理解夏竦传记中存在的形象塑造和政治文化背景同样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夏竦以文学和政治成就最为瞩目,因此对其研究也主要围绕此两方面展开,但是文学领域对夏竦作品、生平及《文庄集》版本流传的探讨^①,与史学领域对夏竦与仁宗朝政治、庆历新政

[收稿日期] 2023-03-04

[作者简介] 刘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宋史;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书院历史与文化。

① 主要研究成果有:陈满荣《夏竦及其骈文创作》,南昌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孙刚《论夏竦诗歌的过渡性》,《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1期;孙刚《夏竦帖子词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段莉萍《北宋诗人夏竦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王珽《夏竦诗歌研究》,西南交通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黄盼、谭新红《夏竦〈文庄集〉版本源流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1期;等。

关系的研究^①，都是对于史事、文本的考订，虽然会涉及到对夏竦的人物评价，但也只是只言片语。虽然也有论者注意到了夏竦的形象塑造，但是依然未能在文本上有深入的探讨，也未能注意文本与背景之间的关系。^② 本文的目的，正是对于夏竦的传记资料中如何塑造夏竦形象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考察在夏竦形象塑造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

一、英宗对夏竦“东宫旧僚”形象的塑造及其政治需要

与夏竦相关的原始传记资料，仅有王珪所撰《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下文简称为“《神道碑》”）存世^③。根据《神道碑》中的信息可知，其应该是嘉祐八年（1063）八月至治平四年（1067）九月韩琦罢相之间^④，在英宗的命令下完成的，是对于夏竦一生的盖棺定论。此外，《仁宗实录·夏竦附传》开始于嘉祐八年（1063）十二月，虽然到熙宁二年（1069）才完成，但基本能代表英宗在位时期国史对于夏竦形象的塑造。^⑤ 这两份传记资料，既是英宗对于夏竦生平功绩的书写，也包含了英宗在位时期的政治需要。

《神道碑》强调夏竦“东宫旧僚”的身份。在天圣三年（1027），夏竦丁母忧被起复知制诰，作为后党的王钦若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⑥ 之后刘后去世，夏竦随即被贬，更说明了夏竦与刘后的关系。对于起复之事，《神道碑》称“是时，章宪太后临朝，以公东宫旧僚，又复其知制诰^⑦”。刘后在临朝后即起复夏竦，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夏竦曾经当过仁宗的老师。其间逻辑无法自洽，正可见王珪修饰的痕迹。而王珪再次在《神道碑》的铭文中强调“东宫旧臣，左右予躬”^⑧，则进一步证明，这绝非仅流于修饰，而是对夏竦形象的塑造。

与塑造夏竦“东宫旧僚”形象相关的，是对夏竦和仁宗君臣关系的书写。对夏政策，是仁宗朝的重大战略，在《神道碑》中也成为塑造君臣关系的素材。据《神道碑》载：

始朝廷锐意兴师，及刘平、葛怀敏继以轻贼失军，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思今宰相臣琦使还陕西，尝言公所以制边之状，于是召为枢密使。议者尤以公怯于用兵，今而用之，则边将之志堕矣。帝为不得已，听罢之镇，密诏慰存之甚厚。^⑨

- ① 主要研究成果有：刘莉《夏竦与北宋仁宗朝政治》，华中科技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庞小翠《夏竦与仁宗朝政治研究》，河北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王魁《宋仁宗朝政治恐慌研究》，西北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等。
- ② 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海浩《夏竦蒙冤的道学环境与史学背景》，《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3期；刘敏、胡坤《歧互与塑造：夏竦传记资料的辨正与相关探讨》，载陈峰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20年版；等。
- ③ 王珪《华阳集》卷47，《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7-350页；又见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之卷22，《夏文庄公竦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7页下栏-第180页上栏。两个文本内容一致，我们在下文统一用《华阳集》之《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展开讨论。
- ④ 《神道碑》中存在的称呼和人物所带官职差遣，为锁定书写时间的关键。王珪在《神道碑》中对仁宗的称呼颇值得注意：其一，“仁宗封庆国公，初选文学之士，以传道经义。”（王珪《华阳集》卷47，《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第347页下栏）据《长编》记载，（嘉祐八年）八月庚辰，王珪议上大行皇帝谥曰神文圣武明孝，庙号仁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9，嘉祐八年八月庚辰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825页）据此可知，此神道碑当书于嘉祐八年八月之后。其二，“臣珪伏思先帝临御之日久，其选用材贤，可谓至矣。”从仁宗在位时间四十余年，夏竦之主要活动时间也在仁宗朝看，此“先帝”当指仁宗，亦可与其一相互佐证。此外，其称韩琦为“今宰相”，韩琦任宰相从（嘉祐三年六月丙午）枢密使、工部尚书韩琦依前官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7，嘉祐三年六月丙午条，第4512页）起，到（治平四年九月）辛丑，韩琦罢为司徒、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宋史》卷14，《神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6页）据此可知，《夏竦神道碑》应该在嘉祐八年八月到治平四年九月之间书写完成。
- ⑤ 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第六章第二节《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四朝（实录）的修纂》，《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天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3，天圣三年七月壬寅条，第2385-2386页。
- ⑦ 王珪《华阳集》卷47，《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第348页。
- ⑧ 王珪《华阳集》卷47，《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第350页下栏。
- ⑨ 王珪《华阳集》卷47，《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第349页上栏。

宋朝对夏的三川口之战和定川寨之战均以告败收尾。而在此之前,陈执中、王德用、富弼等人均主张对元昊采取强硬政策,而夏竦上书十策,认为现在的元昊之势力已非以往之李继迁可比,应以防御为主^①。这也成为其被指为“怯战”的理由。庆历三年(1043),夏竦被召为枢密使后,“议者”以其怯于用兵,纷纷上言,最终夏竦只得归赴本镇。对于此事的记载,王珪《神道碑》与其他诸书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中王珪特别强调仁宗的态度。在三川口之战、定川寨之战败后,王珪在《神道碑》写道“天子悔不用公言”,在夏竦升任枢密使的除授为言者所逼退时,王珪又言“帝为不得已,所罢之镇,密诏慰存之甚厚。”虽然在传记中,通过传主为皇帝所深知的模式化书写来实现对于传主的肯定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此《神道碑》却因涉及到对夏战略的书写,而显得有塑造成分。其曰“又明年,朝廷贷元昊之罪而西边罢兵。仁宗终以公言为是。”^②在庆历四年(1044)对西夏罢兵以后,对于西夏主和的政策一直延续到英宗时期,“仁宗终以公言为是”之语云云,一方面是对夏竦防守政策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仁宗形象的塑造。

事实上,韩琦与夏竦商定攻守两策后,由韩琦和尹洙向仁宗皇帝上书,仁宗是坚持进攻之策的,此事更是得到了韩琦的支持,并由泾原、鄜延两路出兵。^③而在《神道碑》中,王珪开始即以“朝廷锐意兴师”为仁宗打掩护,将战败的罪责推于“朝廷”,此后又通过书写仁宗的及时悔悟,最终认同夏竦防守主张,来塑造“仁圣之悔”的明君形象。另一方面,通过结果验证了夏竦防守政策的正确性,从而进一步塑造君臣深知的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以“东宫旧僚”的夏竦形象为出发点的。

这番塑造,实出自于英宗的授意,王珪明言“有诏史臣珪论次公之世系,与夫行事,以刻其墓碑。”^④此时已经距离皇祐三年(1051)夏竦去世有十余年之久,尘封的过去又被英宗重新拾起,自然有其政治上的需要。

英宗本为宗室子弟,在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扶持下才得以即位。前朝旧臣的存在和曹太后的临朝听政,使英宗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在此政治压力之下,英宗对于前朝旧臣“结党”的行径更是存有芥蒂,从治平二年(1065)发生的蔡襄请假一事便可见一斑。有外人云蔡襄在拥立英宗一事上颇有异议,此事并未得到验证,随后便有蔡襄在三司使任上请假之事。《长编》载曰“上疾既愈,数问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⑤在收到蔡襄的请假申请之前,英宗便可能已有更换三司使人选的安排,不过从“何不用别人”云云看来,却尚是与大臣商榷之语气。而接下来韩琦和欧阳修等人也为蔡襄辩解,韩琦认为蔡襄才干难得,而欧阳修则认为蔡襄请假是因为家中有老母需要照顾,罢去蔡襄三司使实不可取。这时候英宗虽有怏怏之色,但是并未反驳,直到触及废立之事。

在关于蔡襄对英宗即位颇有异议的传闻散布开来以后,蔡襄请罢三司使,而韩琦、欧阳修、曾公亮等人纷纷上言,认为此事不可轻信,不可贸然罢免蔡襄时,英宗态度转而变得强硬,“上曰‘造谤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出守。”^⑥蔡襄请假一事尚可商榷,但是对待蔡襄异议一事,英宗的态度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决。他所忌惮的,一方面是自己由宗室子弟入继大统的软肋,另一方面则是仁宗旧臣班底的存在与相互援结给皇帝权力造成的强压氛围。

也正是因为长期处于这种强压氛围之中,使英宗认为援引自己的亲信变得十分必要,对于李受、王畴等人的重用便是其所采取的措施,而在这举措的背后,塑造相应的祖宗故事便成为应有之义。仁宗皇帝既是英宗皇权的来源,其故事对于朝臣也具有震慑力和感召力。而作为仁宗东宫旧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丙子条,第2910-2913页。

② 王珪《华阳集》卷47,《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第349页下栏。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条,第3098-3100页。

④ 王珪《华阳集》卷47,《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第347页上栏。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二月辛丑条,第4946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二月辛丑条,第4947页。

僚与司马光、欧阳修、富弼等人存在龃龉,对于西夏主张防守的夏竦,成为英宗此时所试图利用的政治资源。

更有意思的是,欧阳修在为蔡襄上言的时候,就曾提到夏竦伪作诏书事。其曰“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学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乃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赖仁宗圣明,弼得保全。”欧阳修在这里想以仁宗旧事提醒英宗“陛下幸勿致疑。”英宗以“造谤者因何不及他人?”之语回绝劝诫,对蔡襄此事以皇权一锤定音,其间又不无对欧阳修所描述夏竦“奸邪”形象的怀疑。^①或许正是英宗与欧阳修、富弼等人之间的不信任,推动了英宗塑造夏竦形象的进程。

皇权授命下塑造夏竦形象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展开的。夏竦《文庄集》的编订,或许正是该进程之一环^②。据《文庄集》序言载“元孙尚书比部郎中伯孙,倭故吏工部郎中张君宗益、秘阁校理裴君煜汇次遗集,成百通。后数载,见俾序之。”^③张宗益在治平二年为文彦博所举,所带之本官为“都官员外郎”^④。而张宗益在整理《文庄集》时所带本官为“工部郎中”,因此,张宗益整理《文庄集》在为文彦博举荐之后的可能性较大。从目前所见,暂未有宋敏求与夏竦过往的记载,序文中“数载”云云虽非确数,但是从宋敏求在序言中对夏竦防守西鄙政策的高度评价多与英宗时期对外政策相符合看来^⑤,宋敏求为夏竦的文集作序,其间或许有英宗的因素。

英宗时期对夏竦正面形象的塑造,更是贯彻到了国史书写中。《仁宗实录·夏竦附传》今已不存,我们无从看到其对于夏竦整体形象的塑造,但是从《长编》李焘引用的相关片段,可以窥得《仁宗实录》对于夏竦形象的书写取向。为论述方便,笔者将《长编》中出自《仁宗实录·夏竦附传》的记载彙录如下:

初,丁谓欲大治城西礲场,酾金水,作后土祠,以拟汾阴雘上。林特欲跨元武门为复道,以属玉清昭应宫。李溥欲致海上巨石于会灵池中,为三神山,起阁道,几遇神仙之属。群臣亦争言符瑞。竦独抗疏,皆以为不可,其事遂罢。^⑥

通过对文句的核对可知,此段记载与《神道碑》切近。^⑦虽然不知《仁宗实录·夏竦附传》这段是否抄自王珪所书《神道碑》,但是采用近似的文句来描述,说明书写者与王珪的《神道碑》呈现出的态度基本一致。而真宗“神道设教”之事在仁宗时便被视为荒诞,王钦若、丁谓等人更是因此而被视作“奸邪”。所以,《神道碑》《仁宗实录·夏竦附传》记载夏竦抗疏一事,无疑塑造了夏竦正直的形象。

虽然英宗对《仁宗实录·夏竦附传》中夏竦的形象塑造和历史书写起着精神指示作用,但是负责实际工作的乃是参与编撰的官员。《仁宗实录》的编撰开始于嘉祐八年(1063)十二月,“庚辰,命翰林学士王珪、贾黯、范镇撰仁宗实录,集贤校理宋敏求,直秘阁吕夏卿、秘阁校理韩维兼充检讨官。”^⑧并在治平元年(1064)以宰相韩琦提举此事,此后,冯京、陈荐等人也相继参与此事,直到熙宁二年(1069)七月才正式完成。《仁宗实录》的编撰过程,虽然经历了从英宗到神宗之间的更迭、韩琦罢相,但是依然以王珪为核心,编撰人员基本没有变动,证明皇位的更替,并未对《仁宗实录》的编撰产生干预,因此,《仁宗实录》是在英宗的基调下完成的。而韩琦作为宰相提举此事,是制度上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二月辛丑条,第4947页。

② 据《神道碑》载“文集百余卷”,在王珪撰写神道碑的时候,尚无明确的卷帙,可见此时,夏竦之文集尚未整理,祝尚书在《宋人别集叙录》中亦提及此点。载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2,《夏文庄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6页。

③ 夏竦《文庄集》卷首,《文庄集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页下栏。

④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39,《举张宗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94页下栏。

⑤ 《文庄集原序》载“既而起居兵间,以《新书》《李法》从事,尝奏议边十策,多蒙施用,经略怀来,卒柔异俗。”其间多有对夏竦防守政策之赞扬。(夏竦《文庄集》卷首,《文庄集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47页下栏。)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3,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己酉条,第1904页。

⑦ 王珪《华阳集》卷47,《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第347页下栏。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9,嘉祐八年十二月庚辰条,第4840页。

的惯例,但同时夏竦的形象塑造起着关键作用。韩琦在仁宗任夏竦枢密使一事中起了重要作用^①,而且在任福战败被兴师问罪的时候,夏竦曾站出来为其开脱^②,因此,韩琦虽然在庆历年间主张对西夏进攻,且或多或少参与了庆历新政^③,但是其与夏竦的关系与富弼、欧阳修等人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负责《仁宗实录》的其他人选,也都与夏竦并无旧憾。反倒是精通史笔、又与夏竦颇有过节的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却一直被排除在编撰队伍之外,这也就使对夏竦形象的塑造,能够按照英宗的意志贯彻下去。

二、神宗时期夏竦形象的“奸邪化”和曾巩的“背离”

神宗时期可以称得上是宋代的“分水岭”,其间大政方针的变化,导致对于仁宗时期人、事的褒贬也随之发生变迁,而作为仁宗旧臣的夏竦,也因此被重新书写。与此同时,曾巩却以自己对于材料的选取在《隆平集》中塑造了与国史书写存在差异的夏竦形象。

《两朝国史·夏竦正传》现已不存,其对于夏竦的整体形象塑造,也就无由得见,但保留在《长编》中的相关记载,却可助窥《两朝国史》对夏竦的大概态度。夏竦在真宗“神道设教”活动中的表现,在《神道碑》《仁宗实录·夏竦附传》中便已用作塑造夏竦形象的材料,到了神宗所主导的《两朝国史》,也依然如此,只是塑造的形象截然相反。《长编》载曰“及为判官,居月余,乃奏宝符阁奉神果实,旦起视之无有,渣滓狼藉左右,殆神食之。”^④李焘以出注的形式,对于此事的记载作了说明,其曰:

抗疏排丁谓等,附传有之,正传不载。宝符阁所奏,正传有之,附传不载。盖为正传者,以竦不正,必不能谏前事,故削去,但载宝符所奏,可见竦邪佞故也。然竦抗疏必不诬,附传载其事于竦为知制诰以后,恐失其序,此必未为判官以前事也。竦未为判官,故数有正论,王旦因喜之。及为判官,即附会神怪,侥倖速进,宝符所奏是也。既有宝符之奏,则必不排丁谓等矣。今悉书之,奸人情状,或可由此见尔。^⑤

其中提到的“正传”指《两朝国史·夏竦正传》。到神宗时代,真宗的神道设教活动依然是受到批判的,《两朝国史·夏竦正传》中夏竦抗疏丁谓一事的消失和夏竦奏宝符阁记载的出现,正是为了塑造夏竦附会神怪、参与真宗“荒诞”活动的“奸邪”形象。神宗在位期间,对于修史有着密切的关注,而且很善于利用文本的历史书写来为自己所推行的的大政创造氛围。^⑥对于夏竦“奸邪”形象的塑造,因与其大政方针密切相关,也是其书写的对象。神宗时期推行的王安石变法,是以否定庆历新政作为前提的,虽然夏竦在庆历新政中扮演的主要是反对者的角色,其伪作诏书一事,更是导致富弼和范仲淹去朝,但其却也是对夏防守政策的支持者,这也是神宗时期将其“奸邪化”的原因所在。

作为神宗时期将夏竦定义为“奸邪”的主要原因,对夏政策自然是需要大书特书的。虽然《两朝国史》的不存,导致无法窥得原貌,但还是可以通过比勘文本知其大概。《长编》载“先是,诏陕西安抚使庞籍谕旨知永兴军夏竦议西鄙事。”^⑦在其注文中,李焘称“竦正传云竦在泾州,庞籍就竦计事,竦因此上奏,与实录不同,今从实录。”^⑧“竦正传”即指《两朝国史·夏竦正传》。《宋史》是在国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宋史·夏竦传》也当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许多《两朝国史·夏竦正传》的材

① 王珪《华阳集》卷47,《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第349页上栏。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四月辛巳条,第3113页。

③ 吴铮强、郎启浩《历史记忆的模糊策略:两宋政争与名臣韩琦传的书写难题》,《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3,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己酉条,第1904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3,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己酉条,第1904页。

⑥ 如对于韩琦《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的书写,便是神宗利用历史书写为政治张本的案例。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丙子条,第2910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丙子条,第2913页。

料,又其注文所称“竦正传云竦在泾州,庞籍就竦计事,竦因此上奏”正与《宋史·夏竦传》相合。因此,《宋史·夏竦传》对此事的描述,应该是保留了《两朝国史·夏竦正传》大概面貌的。

而《宋史·夏竦传》虽然记有夏竦所上“十策”,但是后文却续以杨偕之批评,并以“竦意遂屈”收尾,以达到塑造夏竦“依违顾避”、怯于应战形象的效果。^①事实上,夏竦在宝元二年(1039)所上“十策”当时“颇采用之”,而且其中的增置士兵之举,虽然招致杨偕不满,但是却得韩琦大力支持^②,而此事不见于《宋史·夏竦传》。如果前文猜测无误的话,在《两朝国史·夏竦正传》就已如此。

英宗时期的《神道碑》正面书写夏竦对夏的防守政策,但到了以经营河湟、进攻西夏为主政方针的神宗时代,“十策”便成了《两朝国史·夏竦正传》塑造夏竦“怯战”形象的材料,这正与对韩琦的形象塑造形成鲜明对比。韩琦在熙宁八年去世,神宗亲自为其撰写《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就以对夏政策来塑造韩琦的形象。从史料看来,庆历时韩琦对夏持攻策,到了治平二年,凉祚骚扰边境,欧阳修提出要进取横山^③,此时的韩琦态度是模棱两可的。《长编》载曰“愿以臣当时所上四策,令两府共议。”^④而所谓“四策”,指的是与范仲淹同上的《上仁宗论和守攻备四策》,其中提供了和、守、攻三策,并未有明确的倾向性。^⑤到神宗即位以后,韩琦反对种谔进取横山地区的绥州,但是在张定等人被杀后,则又对夏采取强硬态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韩琦的对夏政策是有变化的。但是神宗的《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却将韩琦持守、主和的事迹抹去,塑造韩琦积极坚持政策的正面形象。

而神宗采取这一策略,实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韩琦作为辅佐英宗、神宗上位的大臣,其“定策”之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神宗只能在塑造韩琦正面形象的基础上,抹去其持守主和之事,为自己的对外开边之策张本。^⑥相比之下,夏竦这一人物的争议颇大,给形象塑造留足了空间,而且夏竦本来就为庆历君子所非议,因此,《两朝国史·夏竦附传》就借势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在其中保留对西夏防守政策的内容,将夏竦置于大政方针的对立面,塑造其“怯战”的奸邪形象。

在神宗时期负责过《五朝国史》的曾巩,在其私修史书《隆平集》中为夏竦单独列传。^⑦作为夏竦的传记,自然是以叙述其生平梗概为主,不过《隆平集》却以取材的多样性,塑造了奸邪与才干并存的夏竦形象。首先,《隆平集》中多有与《两朝国史·夏竦正传》相同之记载。如《隆平集》曰:“谏官、御史皆言竦奸邪,在陕西怯于用兵,今用之,则边将之志堕矣。凡十八疏,罢之本镇。”^⑧此事与《两朝国史·夏竦正传》之记载相近,虽然无法确定其间是否有史源关系,但是在文字上的切近,则决定了他们所力图表现的夏竦“怯战”之方面。

此外,曾巩也吸收了不同于《两朝国史·夏竦正传》的材料。前文提到,《两朝国史·夏竦正传》记夏竦奏宝符阁之事,表其附会神怪之举,增其奸邪之气。但是曾巩却不记奏宝符阁之事,反而将夏竦抗疏一事置于传中,与《神道碑》《仁宗实录·夏竦附传》同,将夏竦塑造为真宗神道设教

① 《宋史》卷283,《夏竦传》,第9572-9575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丙申条,第2974页。

③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14,《言西边事宜第一状》,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24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5,治平二年五月癸亥条,第4965页。但据方震华的论述,其认为“同平章事韩琦重提庆历四年进占横山之议”可能存在商榷之处。(方震华《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5页。)

⑤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4,《上仁宗论和守攻备四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5-1500页。

⑥ 吴铮强、郎启浩《历史记忆的模糊策略:两宋政争与名臣韩琦传的书写难题》,《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⑦ 关于《隆平集》的作者,余嘉锡、叶建华、王瑞来等人均主曾巩,而且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证,《隆平集》为曾巩所作当无疑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

⑧ 曾巩《隆平集校证》卷11,《夏竦传》,王瑞来校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21页。

活动的反对者,这绝非出自于与《两朝国史·夏竦正传》有史源关系的材料。因为《两朝国史》的亡佚,我们无法获见《两朝国史·夏竦正传》全貌,但是通过此处可知,曾巩《隆平集·夏竦传》取材的多样性,导致其塑造的夏竦形象与《两朝国史》存在“背离”之处。

这种“背离”与曾巩的修史经历不无关系。元丰四年(1081)神宗下诏“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方朝廷叙次两朝大典,宜使与论其间,以信其学于后。其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国史通修成书。宜与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取三朝国史先加考详,候两朝国史成,一处修定。”^①从这时候开始,由曾巩负责《五朝国史》的编撰,虽然《五朝国史》需要在《两朝国史》和《三朝国史》的基础上完成,但是事实上曾巩并不参与《两朝国史》,直到元丰五年(1082)四月,曾巩被神宗以“巩所著乃是太祖汉高孰优论尔”之由罢修《五朝国史》^②,其在所上《拟辞免修五朝国史状》中云“况两朝国史,臣所未见。”^③可见曾巩即将离任的时候也并未见到《两朝国史》。在曾巩被罢修《五朝国史》后,“元丰五年四月,擢试中书舍人,赐服金紫。九月,丁母忧。”^④虽然《两朝国史》完成于元丰五年七月,但是曾巩这时候已经离开了史职,自此仕途坎坷,在为韩维书制时失职而罚铜,不久便丁忧去职、回到家乡,直至去世,曾巩很可能自始至终都未见到完成的《两朝国史》。不过,曾巩在负责《五朝国史》期间,却可以接触到修《两朝国史》需要的原始资料,并将其中的资料收入《隆平集》,因此,《隆平集·夏竦传》中许多记载都与《两朝国史·夏竦正传》切近。在此基础上,曾巩进行了大量资料的搜集工作,虽然其工作主要在于考详《三朝国史》,但是搜集材料的范围则是囊括了从太祖到英宗五朝的,据其《史馆申请三道劄子》载“其曾任两府、两制、台谏之家,须逐家一一询访,无令漏略。”^⑤夏竦曾任两府,其传记资料也自然得以搜集汇聚,并被曾巩收入《隆平集》。因此,《隆平集·夏竦传》也收入了许多与《神道碑》切近的记载。

既然曾巩并未参预《两朝国史》的修撰,也无由得见《两朝国史》,这就意味着曾巩在《隆平集》中所塑造的夏竦形象,是出自于自己对于材料的去取,而非有意区别于官修《两朝国史》。但是无论无意还是有意,在高压政治氛围下的神宗朝,神宗对于修史的参与度很高^⑥,即使是私修史书,也不被允许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离。虽然《隆平集》撰写的时间无法确定,但是按照其撰写所需的条件,当在元丰四年曾巩负责《五朝国史》之后,从《隆平集》的篇幅看来,多至千字,少则十余字,差距很大,可见曾巩并没有来得及进行排布和雕琢,导致《隆平集·夏竦传》呈现材料堆积、描述上详略不一的状态,《隆平集》很可能在曾巩去世的时候,也尚未真正完成。而据曾肇为曾巩所作《行状》称“平生无所玩好,顾喜藏书,至二万卷,仕四方,常与之俱,手自雠对,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为《金石录》五百卷。公未尝著书,其所论述,皆因事而发。既歿,集其稿为《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⑦对于曾巩生平留下的完成和未完成的著作,曾肇等族人都为其作了整理,但是,唯独《隆平集》未见《行状》及其他曾巩的传记资料提及。如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无误的话^⑧,曾肇作为曾巩之弟,自然不会对其兄修成这样一部史书全然不知,那么,《隆平集》不被曾巩相关的传记资料提及,就颇值得玩味了。通过前文对《隆平集·夏竦传》的探究可知,曾巩所塑造的夏竦形象与《两朝国史》颇有不同,而《两朝国史》一方面是神宗时代对于仁宗、英宗朝的历史书写,另一方面,代表了神宗时期官方的意识形态,起着规定士人言论的作用。曾巩并未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4,元丰四年七月己酉条,第7609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5,元丰五年四月戊寅条,第7830页。

③ 曾巩《元丰类稿》卷35,《拟辞免修五朝国史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7页下栏。

④ 曾巩《曾巩集》附录,《行状》,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90页。

⑤ 曾巩《曾巩集》卷31,《史馆申请三道劄子》,第462页。

⑥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9“神宗恶《后汉书》范晔姓名,欲更修之。”刘德权、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页。

⑦ 曾巩《曾巩集》附录,《行状》,第796页。

⑧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6,《实录类》,第267页。

参预和见到《两朝国史》,《隆平集》相关篇章自然与之颇有出入,这也造成了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疏离。而将与官方意识形态疏离的私人史书著作公之于众,在屡兴诏狱以制约缙绅的神宗时代,是会给曾氏家族带来牢狱之灾的,而这或许也是在曾巩传记资料中对《隆平集》的存在秘而不宣的真正原因。这也从侧面揭示了神宗时期的言论和政治氛围。

三、《东都事略》对夏竦与仁宗政局的书写

南宋王称在其《东都事略》中为夏竦单独立传,并对其进行形象塑造。其一方面有自己的匠心独运,但同时受到了李焘《长编》的影响。另外,《东都事略》对于夏竦的形象塑造也与南宋时人如何认识仁宗政局有密切的关联。而作为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嘉祐之治等,均为南宋时认识仁宗政局的坐标,因此,夏竦在仁宗朝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都事略》中夏竦的形象。

《东都事略·夏竦传》作为夏竦的传记,以叙述传主夏竦的生平经历为主,就此点而言,与其他传记资料,并无太大的区别,甚至在文字上,都与《隆平集·夏竦传》有着较大相似度,这导致王称所塑造的夏竦也是才干与奸邪并存的复杂形象,不过却依然有其独特之处。

对于原始文献的引用,是王称《东都事略》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也在《东都事略·夏竦传》中有所体现。引用作者之作品,以凸显其文学之长,这一策略,数见不鲜,不过王称的引文却对于夏竦的形象塑造有特别的作用。如夏竦应制举,其曰“上书乞应制举,其略曰‘边障多故,羽书旁午……而较其先后矣。’真宗颇嘉之,既中制举。”^①虽然此时《文庄集》已经传世,但是这段材料却是取自于欧阳修《归田录》^②。欧阳修在其中著一“乞”字,揭示夏竦非素守之士的品性,王称原文照抄,仍其用心。又《东都事略》记载了夏竦辞出使契丹一事,曰“天圣三年,丁母忧。是时,章献明肃皇后听政,宰相王钦若素与竦厚善,乃微服至京师,图进取,钦若主之,遂起复知制诰。奉使契丹,竦辞不行,其表有‘父没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等语。当时谓其四六为精绝。”^③所引夏竦上表,同是出自欧阳修《归田录》^④,只是欧阳修并未将其起复的过程写的如此详尽而已。虽然引其辞出使契丹之表,表面看起来并无不妥,但是却放在起复知制诰之后,通过在起复知制诰一事上的进取积极,反衬其在出使契丹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推辞,通过文采烘托夏竦胆怯、进取利禄等性格,使夏竦的奸邪形象更加立体化。

此外,王称在布局谋篇上也颇有自己的“匠心”。在《东都事略》中,王称将夏竦、范雍、程琳、姜遵、赵槿五人同列于一卷。从其任官情况看,夏竦最高曾任枢密使,范雍、姜遵、赵槿为枢密副使,程琳任参知政事,均曾身任执政。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谄媚或者投向刘后之举^⑤,这或许也正是王称此卷安排之用心。王称对于投向刘后行为的态度,见于对程琳的评价“当仁宗之初,章献在御而琳乃以《武后临朝图》为献,尊崇母后,以求容悦。仁宗亲政,非特无怨,而竟用琳,出入将相,几二十年。非仁宗之盛德,亦岂能容之?”^⑥在王称的认知中,程琳既有献谄于刘后之举,就不当

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54,《夏竦传》,“中央”图书馆影印眉山程舍人刻本1991年版,第801页。

② 欧阳修《归田录》之《佚文》,李伟国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

③ 王称《东都事略》卷54,《夏竦传》,第802-803页。

④ 欧阳修《归田录》卷1,第16页。

⑤ 《夏竦传》曰“天圣三年丁母忧,是时,章献明肃皇后听政,宰相王钦若素与竦厚善,乃微服至京师图进取,钦若主之,遂起复知制诰。”此后,“章献崩,罢为礼部尚书,知颍州。”(王称《东都事略》卷54,《夏竦传》,第802、803页)两事均可得到其他史籍的验证,夏竦无论是起复还是被罢,均与章献太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范雍也在章献太后去世后立即被罢,可知其亦为后党。“章献皇后尝营建浮图,遵毁汉唐以来碑碣代砖甃,躬督成之,因获进用。”(王称《东都事略》卷54,《姜遵传》,第812页)姜遵在陕任官时便以修建佛寺讨好刘后。至于赵槿,其取悦刘后之行径则较为复杂,“章献后临朝既久,刘后有婢出入禁中,槿厚结之。”(王称《东都事略》卷54,《赵槿传》,第813页)程琳更是在章献后听政时,向其献《武后临朝图》。

⑥ 王称《东都事略》卷54,《程琳传》,第811页。

在后来为仁宗任用,在盛赞仁宗之德的背后,王称更看到了刘后和仁宗之政的断裂性。王称通过对《东都事略·夏竦传》的书写和篇章安排体现了他对于夏竦亲近刘后之举的“奸邪”认定。但是夏竦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仁宗在位时期,而庆历新政已经成为南宋时人认识仁宗政局的坐标,夏竦与庆历新政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了王称塑造夏竦形象的重要内容。

虽然王称在对夏竦的形象塑造上,创新颇多,但也受到了同时代李焘《长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史实的订正和形象的塑造两方面都有体现^①。而作为塑造夏竦形象的重要内容,对夏竦与仁宗政局关系的书写,既是《东都事略》《长编》等书史观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人对于仁宗政局普遍的认识。庆历新政作为南宋人认识仁宗政局的坐标,夏竦与庆历新政的关系自然也成为南宋时人关注的重心。而在夏竦与庆历新政相关的事情中,以夏竦伪作诏草和告石介诈死两事最为人所瞩目,但是这两事显然不适合置于夏竦的传记资料中,因此王称对于此两事的书写是通过在《东都事略·夏竦传》外的其他卷帙来实现的。

理解王称的《东都事略》如何书写伪作诏草事,首先得明此事记载之史源。而在史料中,以《长编》对史源的交代最为具体,为论述方便,笔者将其逐录如下:

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为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是宣抚陕西、河东。^②

据《长编》的注文称“今据弼《自叙笥子》,增以夏竦伪作书诏事。”^③此处李焘并不注明《两朝国史》《仁宗实录》如何记载,不载的可能性较大,而《隆平集》不载此事,更加证实了这一猜想。注文所云“《自叙笥子》”据王魁称,指的是富弼在熙宁元年给神宗所上之《叙述前后辞免恩命以辨谗谤奏》,当得其实。^④在此奏中,富弼交代了事情的经过,其曰“其所谗者,尽是窃弄权威,惑乱朝廷,谓臣欲谋废立。以至使其党学臣等三两人所书字体,伪写作臣等往复简帖,商量废立之事,又别使人缴进,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谋也。”^⑤至于“夏竦伪作书诏事”,不知李焘采自何处,但欧阳修所上《又三事》却明确指出是夏竦,其曰“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子学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乃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⑥李焘将两事捏合,将伪作书诏一事归于夏竦一人。

在富弼的自陈中,“谓臣欲谋废立”“使其党”“又别使人缴进”云云,可见伪作书诏事应该包括从告富弼谋废立,到伪作书信以及书信上呈的整个过程,并非一人所为,而且所针对的是“三两人”,富弼作为直接受害人,自然没有妄言的道理,也就是说,此事是两个群体矛盾冲突所致。虽然欧阳修与夏竦颇有宿憾,但是也只是指陈夏竦参与了伪作环节。而李焘的这一书写,首先将伪作书诏事归于夏竦,并进一步将富弼、范仲淹两人去朝直接归因到伪作书诏事上,因此,夏竦也就成了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这一书写,也为王称所继承,其在《东都事略》中称“竦怨之,会介奏记

① 部分史实的订误,比如《东都事略》载曰“仁宗封庆国公,宰相王旦荐竦才,遂命教庆国公书,未几,同修起居注。”此语显然借鉴了《长编》的考证,又如在夏竦与真宗神道教活动的关系上,也基本采取了《长编》的记载。至于形象塑造,详见下文。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第3637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第3637页。

④ 王魁《宋仁宗朝政治恐慌研究——以石介之死为切入点》,西北大学2019年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此外,在《长编》中,既有称引自“自叙笥子”者,也有称引自“叙述前后辞免恩命以辨谗谤”者,但是两种所引之文,均可从《国朝诸臣奏议》所收的《上神宗叙述辞免恩命以辨谗谤》找到原文,据此可知,《自叙笥子》应当就是指的《上神宗叙述辞免恩命以辨谗谤》,只是题名有不同而已。(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75,《上神宗叙述辞免恩命以辨谗谤》,第817页)

⑤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75,《上神宗叙述辞免恩命以辨谗谤》,第817页。

⑥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19,《又三事》,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38页。

于弼,说以行伊、周之事,竦因倾弼等,乃改伊、周曰伊、霍,使女奴阴习介书,为废立诏草,飞语上闻。”^①与《长编》只有详略之别。除了伪作书诏事,《东都事略》对告石介诈死一事也作了同样的处理。

夏竦告石介诈死一事可以说是富弼被贬出朝的延续。庆历五年,徐州人徐直温谋反,在其家中搜到了和石介的往来书信,据《长编》载“竦因言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执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羁管介妻子于他州。”^②在《长编》中,夏竦言介实不死,是可以得到其他史籍验证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李焘明言夏竦针对的是富弼,从“执政入其言”语看,显然“执政”并非夏竦,至于执政到底指何人,现已无从得知,不过可以知道的是,在朝局中对于范、富等人不满者实不在少数,章得象、陈执中便在其列。^③因此才有人将夏竦之言上达天听。这一点,也可以得到富弼的自陈和《隆平集》的验证。在富弼的笏子中,其称“有人谗臣怨望朝廷,石介诈死,却是富某密使入北敌。”^④“有人”云云,不无含糊之处,或许正是因为难以指明,《隆平集·石介传》载“而或谓介诈死,投北虏矣。夏竦请发其棺验视,又有请羁管其子弟。”^⑤其中的“或”字虽无法确指,但显然是与夏竦区别开来的。因此,告石介不死一事,是群体的行为。

此外,夏竦告石介诈死的针对对象其实也颇为模糊。据何郯的上奏称“夏竦岂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盖以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日,夏竦曾有枢密使之命,当时亦以群议不容,即行罢退,疑仲淹等同力排摈。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荐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恶。”^⑥何郯此奏虽然指控夏竦,但是却认为夏竦告石介不死的目的在于范仲淹和富弼等人。

《宋史·石介传》载曰“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⑦《宋史》的传记部分虽然基本是在国史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宋史·石介传》和《两朝国史·石介正传》的关系无法确知,但巧妙的是,在《长编》关于此事的记载中,李焘注明了《两朝国史·石介正传》的情况。其曰“石介附传、正传并云,介诈死,北走契丹,无往登、莱结金坑凶恶事。”^⑧“介诈死,北走契丹”云云,正与《宋史·石介传》相合,《宋史·石介传》此段或许正是《两朝国史·夏竦正传》的原貌。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两朝国史·夏竦正传》也认为夏竦这一告石介诈死是针对杜衍等人。

虽然各说纷呈,但是早期的文献,基本认定夏竦告石介之诈死,为多人所参与,是对于包括富弼在内的群体而发的,且从结果先下诏验石介之死,后富弼被调离,石介之妻子受牵连等事看来,亦可见仁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虽然说《长编》已经凸显了夏竦与富弼的矛盾,但是到《东都事略》才将政治群体之间的矛盾简化书写为夏竦对于富弼的直面冲突。

通过对两事的考察可知,虽然夏竦均有所参与,但是早期的文献主要将其描述为朝廷之上群体的斗争事件,到了《东都事略》则描述为夏竦与富弼两个人的冲突,而富弼又为庆历新政的主要干将,这也就将夏竦摆在庆历新政的对立面,而且随着庆历新政人物韩琦、石介等人形象的典型化,夏

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68,《富弼传》,第1037-1038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7,庆历五年十一月辛卯条,第3805页。

③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庆历中,富郑公、韩魏公俱少年执政,颇务兴作。章郇公位丞相,终日默然如不能言。或问郇公,富、韩勇于事为何如?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踉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踉时,势难遏也。’后富、韩二公阅历岁月,经涉忧患,始知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纷更。而王荆公者,年少气盛,强项莫敌,尽取祖宗典制变乱之。二公不可救止而去,始叹郇公之言为贤也。”(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0,第156-157页。)邵博之父邵博温支持旧党,邵博之态度一如其父,其所夸奖的是章得象预判形势的能力,而从侧面看,实则揭橥了庆历新政失败,或许正与章得象等人的态度有关。

④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75,《上神宗叙述辞免恩命以辨谗谤》,第817页。

⑤ 曾巩《隆平集校证》卷15,《石介传》,第445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0,庆历七年庚午条,第3877页。

⑦ 《宋史》卷432,《石介传》,第12836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7,庆历五年十一月辛卯条,第3806页。

竦与之存在的复杂关系也逐渐从史籍中消失,从而使夏竦的人物定位更为明晰,但是也更为“奸邪化”。虽然《长编》《东都事略》均为私修史书,但是此两部史书均得以进奉朝廷,而且广泛流传,可见其能反映当时官方史学对于仁宗政局的史观。也正是官方史观的认识,推动了夏竦形象的“奸邪化”。

宋室南渡之后,高宗确立了“最爱元祐”的口号,标举推行元祐之政,并一度成为南宋时期的“祖宗家法”。如在王称生活的年代,就有“庆元”年号,“庆元”所标榜的正是追崇“庆历”“元祐”之治。据曹家齐研究表明,在“爱元祐”的口号背后,更有“遵嘉祐”的最高指归^①。在当时的士人言论中,言必称庆历、嘉祐。林羽曰:“故隆兴、乾淳之间,东南之生齿繁庶,吏称民安,熙然有庆历、嘉祐之治。”^②虽然时人以庆历与嘉祐并提,不过在他们的心目中,“嘉祐”可谓盛世之极。在胡安国的奏议中,他认为实现盛世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大臣与台谏。其曰:“仁宗皇帝信王曾之正,任吕夷简之才,终以富弼、韩琦为宰相,而余靖、蔡襄、贾黯、吕晦等迭居台谏,此真伪所由核也。故丁谓虽以奸邪当国而终投四裔;范仲淹虽屡以危言获罪,欧阳修虽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而皆终闻政事。是邪说不得乱毁誉之真,而直道行也。”^③在时人的认知中,奸邪的被辨别和离朝,是嘉祐之治实现的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嘉祐之治的实现,便包含了辨别和驱除奸邪的政治任务。

而未能达到嘉祐盛世的庆历新政时期,虽然也有庆历诸君子的努力,但是却未能完成驱除奸邪的任务,而塑造“奸邪”也就成了南宋时人书写庆历政局的部分。夏竦伪作诏书,直接导致了范仲淹和富弼的出朝和庆历新政的失败,加之又有被树立为正人君子的欧阳修之指控,夏竦也就成了王称笔下“奸邪”的最佳人选。

四、《宋史·夏竦传》中元朝史臣对细节的模糊处理和篇章调整

《宋史·夏竦传》是在《两朝国史·夏竦传》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然而到元朝史臣手里,其对于原来的《两朝国史·夏竦传》作了两方面的处理:细节的模糊处理和篇章布局的调整。

前文提到,《两朝国史·夏竦正传》有记夏竦奏宝符阁一事,并一直存在于《长编》《东都事略》等书中,但是发展到《宋史·夏竦传》,此记载便消失了,这使夏竦与真宗“神道设教”活动的关系断裂,形象更为平实。此外,夏竦在庆历三年被召为枢密使,但是遭到谏官余靖、御史沈邈等人的抗议。据《长编》载:“前后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罢竦而用衍代之。”其下有注,“而竦正传云十八疏,今从正传。”^④可见李焘的这条记载,出自《两朝国史·夏竦正传》,此事也一直见于《隆平集》《东都事略》等诸书,而到《宋史·夏竦传》则曰:“章累上,即日诏竦归镇。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书。岁中,加资政殿学士。”^⑤“十八疏”以精准的数字来描述夏竦被反对的程度,而《宋史·夏竦传》这一模糊处理,使夏竦的奸邪形象退化。

这一对细节的模糊处理,发生在从《两朝国史·夏竦正传》演变到《宋史·夏竦传》过程中的具体哪一环节,虽然史无明文,但是可以就修史的情况窥得一二。淳熙二年(1175),洪迈在继李焘之后修《四朝国史》,到淳熙十三年(1186)完成,并向孝宗提出要“合九朝为一”,对内容进行删改^⑥。这一提议随着高宗去世于淳熙十四年(1187),洪迈负责“永思攒宫之役”而作罢。而《高宗实录》的修撰任务紧随其后,也就无暇顾及对于旧史的修改。嘉定二年(1210),理宗命李心传修《中兴四朝国史》,淳祐二年(1242),帝纪部分完成。淳祐十一年(1451)赵以夫再次重提贯通原有的九朝国

① 曹家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② 林羽《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10,《恤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4页下栏。

③ 胡寅《斐然集》卷25,《先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7页下栏。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乙巳条,第3365页。

⑤ 《宋史》卷283,《夏竦传》,第9576页。

⑥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4,《九朝国史》,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68页。

史,并与《中兴四朝国史》合而为一。既为“贯通”,自有整理之意,但是赵以夫提议一出,即为高斯得、赵汝腾等人指摘去职而作罢^①,此后便未见有重新整理北宋旧史的提议,直至南宋覆亡,整理之议屡屡作罢。此外,南宋史臣对于《两朝国史·夏竦正传》并未有过整理,亦可从元朝史臣袁桷的记载获得验证。

据袁桷称“天圣三朝正史,记载多有谬误。盖修史官夏竦所为,吕夷简受成而已。其列传遂以寇准、丁谓同传,所宜改正。若此非一。”^②丁谓之形象,在北宋就已趋于奸邪化,《东都事略》更是将王钦若、丁谓同置于一传,从此传的“臣称言”可以看出,其同置一卷,是出于对两人在真宗神道教活动中发挥作用的考虑^③,南宋的道学家也与之观点相差无几^④。袁桷所见国史中的丁谓之传却依然保持《三朝国史》的体例,体例是修史宗旨的直观反映,其保持原貌,正反映南宋史臣并未根据时代的变迁,对宋代前五朝国史进行体例层次的基本修改,更勿论史料中的细节。因此,《宋史·夏竦传》对于部分记载的“模糊化”处理,应该是元朝史臣所为。

除此之外,袁桷之言亦可证明,《宋史》将王钦若、丁谓、夏竦置于一卷,是元朝史臣调整的结果。而这虽然看起来是元朝史臣的新创,实际上则是受到了南宋史观的影响。作为卒章以显志的卷末评论,尤能体现这种影响。论曰“王钦若、丁谓、夏竦,世皆指为奸邪,真宗时海内义安,文治洽和,群臣将顺不暇,而封禅之议成于谓,天书之诬造端于钦若,所谓以道事君,固如是耶?竦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⑤史臣所言,既是对传主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其篇章安排之原因。王钦若与丁谓同卷,自《东都事略》已然如此,《宋史》不过是沿此用心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史臣将夏竦与王钦若、丁谓置于同卷理由乃在“竦阴谋猜阻,钩致成事”,其后所接则是结果“一居政府,排斥相踵”,可见指夏竦在政治中之表现。而夏竦在政治中招致排斥,且又符合“阴谋猜阻”者,以伪作书诏和告石介诈死两事最著,这两事也是《东都事略》《长编》等将夏竦置于庆历新政对立面的主要冲突事件。也就是说,元朝史臣将夏竦与王钦若、丁谓同卷的原因在于,其扮演了庆历新政中的反派角色,从这一点而言,亦是对南宋史观的沿袭。

然而,元朝史臣在《宋史》篇章布局上之用心,却与其模糊处理不无违和之处。《两朝国史·夏竦正传》原载有夏竦奏宝符阁之事,元朝史臣在《宋史·夏竦传》中将其删去,反倒使夏竦与王钦若、丁谓的共同点减少。此外,《两朝国史·夏竦正传》原载有夏竦被召为枢密使为“十八疏”所退之事,元朝史臣在《宋史》中也删去此记载。相较于之前,在塑造夏竦的奸邪形象上无疑是“退化”。可以说,元朝史臣的“模糊化”处理对其篇章立意有所冲淡,但是也正见出元朝史臣的细致。夏竦奏宝符阁一事诸记载各执一词^⑥,而“十八疏”云云,从《长编》的注文亦可看出显有夸饰^⑦。虽然两事的保留,可以使《宋史·夏竦传》与同卷的其他传主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从而使其卷帙安排更具有合理性,夏竦的形象也更为“奸邪”,但是出于对材料的审慎态度,元朝史臣依然将其删落。

四、结语

对于夏竦形象变迁的探究,既可明晰夏竦传记资料的编撰过程,即蔡涵墨所谓的“文本考古

①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2,《十月二十三日进故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页上栏。赵汝腾《庸斋集》卷4,《缴赵以夫不当为史馆修撰事奏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6页。

② 袁桷《袁桷集校注》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杨亮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45页。

③ 王称《东都事略》卷49,《王钦若传》,第738-739页。

④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6,《求直言》,张其凡、白晓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

⑤ 《宋史》卷283,《夏竦传》,第9578页。

⑥ 《仁宗实录·夏竦附传》《神道碑》均只记夏竦抗疏一事,而《两朝国史·夏竦正传》只记夏竦奏宝符阁一事,各执一词,颇有争议。

⑦ 虽然《长编》称有“十八疏”,但是从注文可知,李焘所见也只有“十一疏”。

学”的意义,亦可反映政局的变动。夏竦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地“奸邪”。《夏竦神道碑》由英宗下诏给王珪书写而成,代表了英宗时期的政治需要,所塑造的“东宫旧僚”形象,是其在朝堂之上孤立无援的反映,因此,在《仁宗实录·夏竦附传》也以正面塑造为主。到了神宗时期,以对夏持防守政策的夏竦,因不符合政策需要,而在《两朝国史·夏竦正传》中趋于“奸邪化”,曾巩的《隆平集》因其史料的选择与《两朝国史》有区别,因此所塑造的夏竦形象与之颇有不同,但却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下,不得不隐瞒此书之存在。宋室南渡后,庆历新政的地位逐渐上升,甚至成为榜样,夏竦作为庆历新政反对者的角色逐渐凸显,这促使在《长编》和《东都事略》等书中夏竦“奸邪”的程度逐渐加深,对与庆历君子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书写细节愈加丰满。在南宋末期,虽然理学家逐渐占据了话语主权,但并未对国史中的夏竦传记进行相应的修改,直至宋室灭亡。虽然元朝史臣对夏竦的认识是建立在南宋史学家的基础之上的,但其在篇章布局上和史料上都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在篇章布局上,更为强调夏竦作为庆历新政的反派角色;但是在另一方面,史料上更为审慎和考究。

对夏竦形象的重新认识,使仁宗政局中未曾为人注意的面相也逐渐被揭开。一方面,对于庆历新政中“革新”与“保守”两派的重新认识。曾经被认为是庆历新政中主要人物的韩琦,与被看作是庆历新政反对派的夏竦关系十分复杂。韩琦在任福战败后,夏竦为之开脱,夏竦在庆历三年被召为枢密使,也与韩琦不无关系,此外,在夏竦和杨偕在士兵问题上发生争论时,韩琦对于夏竦投以支持,等等,这虽然均是表面现象,但足以让我们对庆历新政中存在的对立产生怀疑。另外,庆历新政如何失败,也需要重新认识,而这首先要从剥离史料的“面纱”开始。通过对夏竦形象的考察发现,不同时期书写的重点不同。神宗时期的变法,是以否定庆历新政为前提的,凸显的是夏竦“怯战”的一面。南渡后的宋室,以承绪嘉祐、庆历之治为标榜,夏竦作为庆历的对立面成为“焦点”,反而使其他在朝者反对庆历新政的记载“失焦”。而重新认识庆历新政和仁宗政局,首先要摆脱不同时期存在的“焦点”记载的束缚。

The Creation of Xia Song's Images in Biographies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I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Liu Min & Deng Hongbo

[Abstract] The images of Xia Song had changed in Song and Yuan. Fearing of Emperor Ren's closest ministers, Emperor Ying had made Xia Song be a follower since he was a prince in Xia Song's Monument, which affected Xia Song's biography in Emperor Ren's Veritable Records. Xia Song's policy to the Western Xia didn't agree with Emperor Shen's, which resulted the images of Xia Song be smeared in *LIANGCHAOGUOSHI*. At the same time, Zeng Gong had made a different image in *LONGINGJI*, but it was hidden. Wang Chen expatia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Xia Song and participants in the Qingli Reformation in *DONGDUSHILVE*. The official historians in the Yuan Dynasty had modified some details in Xia Song's biography in the *LIANGCHAOGUOSHI*, and then completed his biography in *SONGSHI*. With the study of the creation of Xia Song's images and its background, it not only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Xia Song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mperor Ren Era better, but also learn the change of the periods.

[Key words] Xia Song Qingli Reformation creation of imag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责任编辑 汪高鑫)